

大灣區須路通財通 資源共享優勢互補

曾淵滄博士

特首梁振英近日率領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前往粵港澳大灣區6市訪問，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廣州與梁振英會面時強調，大灣區必須做到人流、物流和資金流互通。大灣區要做好地鐵、高鐵等交通建設，把大灣區建成一小時生活圈，香港應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積極主動融入大灣區，把握發展的新機遇。

不久前，河北省雄安新區的開發引起傳媒的廣泛報道，因此，本港不少人把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與雄安新區的開發相提並論。實際上，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雄安新區是北京市的擴大，把北京市內過於擁擠的非首都功能的機構搬到雄安新區，因此，雄安新區在未來一段時間處於建設階段，大量興建房屋、鐵路、公路、電訊電纜，是一個新建的城市。

歷史悠久發展成熟

而大灣區不是一個新的發展區，大灣區的面積是雄安新區的許多倍，已有相當長的發展歷史，廣州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經是非常繁榮的城市，香港、澳門更不用說，連深圳也開始面對土地不足難以再進一步開發的情況。因此，大灣區的規劃，基本上的要求是促進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聯繫合作，把城市與城市

連接起來，成為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城市群。

先做好交通規劃

因此，大灣區的規劃，首先要做好交通規劃。我們已經看到廣州市區的地鐵將開到南沙區，深圳的地鐵也通往惠州市的惠陽區。地鐵是非常重要的城市交通，想想香港多年前太古城剛剛推出市場時，地鐵未通，不值錢；地鐵一通，馬上成為藍籌屋苑。因此，有朝一日，大灣區城市群之間必定會佈滿地鐵線，這包括香港和澳門。目前，香港只有羅湖與落馬洲兩條地鐵線連接深圳，這是不夠的。而且，目前羅湖與落馬洲兩個口岸實際上來自同一條路線，即東鐵線，這也是不夠的。將來，東涌線、西鐵線、地鐵線都應該連接深圳。更長遠

而言，應該通往澳門、珠海。還有，港珠澳大橋也應該由目前的單「Y」型改為雙「Y」型，可以連接深圳，所有的口岸也必須有更大的地方來處理物流、人流，滿足通關的要求。香港應該開始鼓勵使用人民幣，把人民幣定為法定流通貨幣，真正做到人流、物流、資金流的互通。

除了地鐵互通外，大灣區區內城市相信也會增加高鐵的建設，進一步把大灣區各城市的距離拉近，成為真正的生活工作城市群，只需1至2小時的時間就可以往來於大灣區的各個城市。

在大灣區開發的過程中，香港最重要的功能就

是提供融資的渠道，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同時盡可能方便大灣區的居民來香港旅遊，通過電子儀器通關，提高效率，還可以考慮把目前的邊境禁區開發成為科技城，大灣區的科技人才更方便進出，創新創業創富。



■特首梁振英近日率團考察粵港澳大灣區6市。圖為梁振英與代表團參觀南沙自貿區規劃館，了解區內基礎設施及周邊規劃。

以大視野看大灣區

楊云 時事評論員

行政長官梁振英率團前往粵港澳大灣區廣東省6個城市考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3月初的全國人大會議宣讀《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到「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其後，林鄭月娥成功當選新一任特首，國務院正式任命時亦提到「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大灣區近期成為香港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

有趣的是，一些朋友談到「大灣區」，口吻像電影《國產凌凌漆》中羅家英對周星馳所說的那句經典對白：「國家終於有任務畀你」。在他們眼中，對「大灣區」很陌生，如今出現在政府的工作報告中，自然感覺是中央給予香港的「任務」，對於香港，剩下的就是「接受」與「完成」。這種心態，不難理解，然而我們可以將視野開拓一點，看清「大灣區」對香港的三層意義，將是另一種心態。

「大灣區」對香港有三層意義

先從最切身的土地問題說起。大灣區的發展與我們面對的深層次矛盾息息相關。房屋供不應求、人口老化、社會流動不足、產業結構單一，這些大家最關心的民生問題，其基礎都涉及「發展」問題。香港作為一個發展成熟的城市，逐漸面對發展空間不足的挑戰，而同時出現不少城市老化帶來的難題。一般而言，要應對發展空間不足，大多城市都會採取向外擴張、填海造地的策略，以增加城市的容量。以大

家經常提及的新加坡為例，由當初只有約580平方公里的面積，不斷填海造地至約714平方公里，而且其未來規劃亦會繼續造地，以擴大容量。

反觀香港，郊野公園土地「神聖不可侵犯」，填海亦經常引起爭議，在多番折騰後，白白錯失了不少時間，深層次矛盾愈積愈深。如今適逢「大灣區」發展，正好去思考，我們除了繼續自己造地外，善用鄰近地區的土地資源，紓緩香港內部的土地壓力，這策略就有如澳門跟珠海橫琴的關係，值得香港借鏡。

第二層意義，是有關香港的長遠競爭力。香港要保持國際城市的地位，必須要維持競爭力。惟現實是，香港近年面對愈來愈激烈的競爭。「競爭」主要有兩個方向：一個是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競爭，近年最引人關注的對手自然是新加坡；另一個是與內地主要城市的競爭，尤其是鄰近的廣州、深圳。

「大灣區」戰略對於香港而言，一方面能透過與周邊城市的聯動，加強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則在於將香港與廣州、深圳等城市置於同一陣營之中，由「對手」轉為「戰友」，發揮優勢互補。尤其是未來的「競爭」規模將由「城市」轉向「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2015年的GDP約1.4萬億美元，超過三藩市灣區兩倍，接近紐約灣區，灣區的城市發展潛力尚未完全開發，未來的「城市群」競爭力值得期待。

最後一層，亦是重要的意

義，就是維護香港的「一國兩制」及核心價值。有人對「大灣區」提出質疑，認為香港的核心價值會在與內地融合的過程中被侵蝕。這種觀點正反映論者視野的偏狹。香港回歸了將近20年，國家在這段期間全速發展，但香港步伐緩慢，事實上香港對於國家的重要性，最起碼在經濟層面已今非昔比。「大灣區」的戰略思維，是劍指國際市場，配合「一帶一路」，當中所需要的，正是香港的強項。在「大灣區」的發展中，香港的法治制度、專業服務正可大展拳腳，這正是香港核心價值重要性的彰顯。

「大灣區」是大機遇

通過認識這三層意義，我們就會發現「大灣區」，不是任務，而是機會。

近年，「本土主義」興起，「本土」的原意是愛香港，不是壞事，然而時下流行的「本土」被人騎劫，「劃地自限」的風氣瀰漫，一葉蔽目，視野難免狹隘，形成「小香港」的心態。「本土」應該是要用「大視野」，成就「大香港」。

對於「大灣區」，不應以「香港為國家效力」的心態看待，而是從兩地互利雙贏合作出發，主動為香港創造更大發展空間。未來「大灣區」的討論可能面對「政治化」的狙擊，成為政客製造政爭的話柄，但筆者相信，只要我們有「大視野」，足以化解政客狹隘的內鬥思維，共同謀求香港的大發展。

特首與中聯辦溝通名正言順必須加強

黃國恩 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林鄭月娥當選特首後，是否如梁振英一樣，馬上與中聯辦官員會面，一度引起關注。中聯辦是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區的代表機構，其中主要職能就是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以及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當中所指的香港各界人士，當然包括特首在內。特首在不同場合，定期或不定期與中聯辦官員見面交流，完全合法合情，是正當不過的活動。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特首具有雙重身份，即所謂「雙首長制」，特首既是香港特區政府（即行政機關）的首長，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在「一國兩制」下，中央不會直接管理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卻是透過特首實施對香港的管治。換句話說，特首既要對香港特區負責，也要對中央政府負責。這種由「雙首長制」衍生出來的「雙負責制」，正正是香港「一國兩制」的核心。

奇怪的是，香港已經回歸祖國20年了，但時至今日，特首與中聯辦官員見面，仍然被反

對派歪曲為中聯辦干預香港事務，是「西環治港」，有人藉此煽惑港人不信任中央，挑撥港人與中央的良好關係，實在居心叵測。

香港並非一個獨立國家，而是中國的一個行政區，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並非完全自治。特首作為中央與港人的溝通橋樑，溝通工作做得好，中央挺港政策落實得好，特區政府施政更暢順，市民更得益。因此，特首必須與中央保持良好溝通，必須加強與中聯辦的溝通，建立恒常有效的溝通機制。筆者認為，特首與中聯辦官員的會面不僅僅是禮節性的拜訪，而且有實質的需要。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特首選舉期間，談及中央對特首人選的要求時指出，除了「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的四大標準外，特首還要「準確地貫徹落實《基本法》，全面、準確、客觀地向中央反映香港情況，提出工作意見；也要用符合香港法律規定、符合香港情況的方法向市民解釋中央的政策，落實中央的決策。」特首既代表香港，也代表中央，要領導香港向前發展，就必須得到中央信任、

港人支持。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央的政策，也為了更好地反映港人的意見，特首有必要加強與中聯辦的溝通，這對暢順施政、提升效率、準確執行中央政策，向中央反映港人意見，均有莫大裨益。

但是，為了干擾、抹黑特首與中聯辦的溝通，最近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提出質詢，要求政府交代特首梁振英任內與中聯辦官員見面的次數以及交談的內容，目的明顯是製造中聯辦干預香港事務、「西環治港」的話題，暴露其無知、傲慢與自大。放着堆積如山的民生議題不去關注，反對派借特首與中聯辦溝通的問題製造紛爭，浪費立法會議事時間，令人反感。

筆者期望，林鄭月娥上任後不畏干擾，加強與中聯辦溝通，幫助港人加深對中央政策的了解，迅速反映執行政策時遇到的困難以及市民的意見，讓中央準確快速掌握情況，增加中央和港人的互信，有利香港的和諧穩定。特首與中聯辦的會面名正言順，大大方方，嚴格按基本法辦事，是為了更好地落實「一國兩制」，根本不用怕反對派說三道四。

有着數時情比師徒 無着數時「晚節不保」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去年失落新界東立法會議席，連帶失去了尊貴的地位和豐厚的薪津，「新民主同盟」也爆發了新一輪的出走潮。所以，對於即將舉行的新界東補選絕對是志在必得，他如果再落敗，恐怕「新民主同盟」一眾也不會再為他抬轎。范國威要參加補選東山再起是他的自由，但他為了競逐議席，卻不斷拿昔日的師傅鄭家富攻擊，對於鄭家富表示有意參加補選，范國威隨即炮轟對方去年「鏢票」是晚節不保、「臨老唔過得世」，認為反對派若舉行初選，應考慮是否容許鄭家富參與，擔心他只是透過初選「洗底」云云。范國威以「民主派」自居，但在補選事件看不到有一絲民主的精神，有的只是恩將仇報的卑劣人格。

首先，參選是香港公民的權利，鄭家富參選關范國威什麼事？何以他不斷攻擊他人參選的意願，難道只有范國威才有權參選？他甚至要求反對派補選也不讓鄭家富參加，看來他真的把自己當作反對派的「盟主」了。范國威過去不停地指鄭家富「鏢」他的票，然而，范國威憑什麼說鄭家富所得的票就是他的？如果這些票都是范國威的，他為什麼不全部鎖入保險箱？事實是，選舉就是優勝劣敗，選民支持誰完全是個人選擇，有人支持鄭家富投他一票，范國威有什麼理由指是「鏢」了他的票。他為什麼又不說梁國雄、陳志全「鏢」了他的票呢？

范國威「鏢票論」的背後，反映他至今仍然沒有反省自己敗選的原因，沒有反省自己的激進本土路線、對「新移民」的歧視言論，是如何引起市民的憤怒。他不斷倒香港

米，選舉落敗是咎由自取，但他卻歸咎於所謂「鏢票論」，如此不知自省，再參選補選也是浪費金錢。

更重要的是，從政人士也要講政治倫理。當年范國威在民主黨只是「小卒」一名，如果不是鄭家富的提攜重用，恐怕外界連他的全名都叫不出。而他前屆成功取得立法會選舉，也是由於鄭家富不再參選之下，全力為他助選所致。先不論鄭家富個人的政見如何，但對於范國威肯定是提攜輔助不遺餘力。固然，在上屆立法會選舉，鄭家富東山再起，但范國威也犯不着對於昔日師傅如此攻擊，甚至指責他是「內鬼」、「收錢鏢票」云云。現在更說「兩人也從來不是師徒」，直斥鄭家富「鏢」票已載入選舉政治的史冊，「唔會抹得甩！」對於往日恩師如此絕情，有着數時情比師徒，無着數時就「晚節不保」，對恩師尚可用完即棄，由此可見范國威的政治品格是如何低下。

固然，范國威氣急敗壞也不是沒有原因，這次新界東補選是他最後機會，否則他的政治生涯隨時結束，而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是，近期香港政治氣氛逐步趨和，所謂激進本土的路線愈走愈縮，令范國威的勝算更低。對他來說，自然是「少隻香爐少隻鬼」，瘋狂攻擊鄭家富不過是為了新東議席而已。然而，范國威此舉反暴露其不堪，愈加流失選民的支持。而且，就算他成功「威嚇」鄭家富不參選，但與他牙齒印甚深的民主黨、求職黨若渴的工黨及其他本土派呢？會讓他嗎？也可以迫退他們嗎？范國威根本缺乏穩勝的能力，在議席面前，沒有一個政黨會讓路給他，迫退了鄭家富，也改變不了范國威的結局。

對教育要堅持專業決策

桂松 資深教育工作者

香港回歸20年，教育改革也有所突破（例如學制改革取得成功，課程發展推陳出新等），但也碰到不少阻力，需要認真對待。

社會大眾重視教育，本來是好事。可是，香港社會競爭激烈，这股風吹到教育圈，產生一些負面影響。由於本港是國際性都市，英文成為重要的溝通媒介，青少年能否掌握英語，關乎其未來的出路，因此，許多家長均強調英語學習的重要性，這是面對社會現實而提出的主觀要求，無可厚非。問題在於怎樣施教，這觸及受眾——學生的接受能力（亦即語文學習能力）。

不少家長強烈要求其子女加入學校的英文班或入讀以英文為教學語言的學校，並沒有顧及子女的適應能力。當年教育局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對教學語言作出「微調」，不再「按照學生語文學習能力決定教學語言」的專業決策，學校被迫增加英文班以迎合家長的需要。5年的實踐證明，英語教學並未達到預期效果。有些學校實行「半中半西」（教科書一律是英文的，教學語言卻是粵語），算是滿足家長訴求。一些中文中學也設法構建英文的「語境」，是否奏效，卻成疑問。

英語教學的加強，是否一定要硬硬硬灌？應否堅持因材

施教的原則？這是衡量教育決策是否專業的標準。

家長是教育的持份者，可是並非所有家長都對教育有正確認識。由於大學學位不足，名校數量亦有限，有些家長為了子女入讀名校和升讀大學，只願「催谷」子女，誤以為子女參加興趣班越多越好，補習更不能缺乏，要「贏在起跑線上」，子女不勝其「繁」，反而不利身心健康。近年這種壓力有增無已，值得社會關注。

近年香港社會政治化，這股歪風不時亦吹入校園。「佔中」運動的發起者和參與者不少是教師和學生，大學畢業典禮成為「雨傘運動」的舞台，一些大學校長、教授受到激進分子的暴力衝擊，「港獨」正在一些校園內蔓延。連行之多年而有實效的學習能力評估（TSA或BCA），也因政治衝擊而爭拗不絕。這些都是對教育專業的嚴重扭曲，此風不可長。如不遏制，校園永無寧日，受損的是教育，受害的是學生。還有個別教育團體，罔顧專業，熱衷教育政治化，在業界造成不良影響，表現使人失望。

社會壓力、教育政治化是香港教育的兩大障礙，只有加以遏制，教育才能沿正軌向發展。但願新一屆特區政府，加大對教育工作的力度，堅持專業決策，使校園面貌煥然一新。

不宜貶低抹黑民間文物收藏

屈全繩

文物市場本應是增強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場所。但近來卻發生了一些抹黑民間文物收藏的事件，特別是G20峰會期間，浙江省根據中央统一安排，在省美術館舉辦的「中國古代金銅佛像藝術特展」，竟被蓄意誣陷。這些中國形象被抹黑的事件，在國內外廣大觀眾心目中投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已經曝光的腐敗分子的犯罪事實表明，某些勢力之所以敢在文物市場上肆無忌憚地吞雲吐霧，顛倒黑白，是因為有利益攸關的個別官員在背後為其撐腰。然而他們的日子不會長久，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我們應當相信，政府有關部門不會對文物市場的亂象長期熟視無睹，更不會被文物利益團體長期綁架。

什麼是文物？文物是歷史留存、傳承下來的不可複製的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亦是歷史的見證和載體。沉澱於其中的基因，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如果這個看法成立，那麼至少有三個問題需要回答：一是今天的文物，應當是前人百年千年前使用的物品。如果我們的先人（包括近代以來的革命者）當時也把這些尚不是文物的物品砸得粉身碎骨，今天「文物大國」的桂冠還能戴在中國頭上嗎？二是應該充分肯定，古往今來，憑「火眼金睛」鑒定文物的正直專家們為保護文物作出了功不可沒的貢獻，但沒有哪一位專家與文物齊壽，也沒有哪一位專家是現存文物的歷史見證人。三是檢閱今天中國各地博物館的藏品，確有歷代王室貴胄之

遺物，但絕大部分還是來自民間收藏，即使今天得以目睹的國寶級文物重器，不少也是由民間保護並從民間徵集的。假如歷史上的官府衙門排斥民間收藏，今天我國的博物館能有多少珍貴藏品？由此可見，文物形成的過程是一個歷史沉澱的過程，當代物品就是後世文物。

民間收藏與官方收藏，是文物收藏的鳥之兩翼，二者並駕齊驅，文物收藏才能海闊天空。但這種正常現象現在卻被嚴重扭曲，每逢民間收藏家要捐贈文物，或者民間收藏家要舉辦展覽，消息一經傳出，文物利益團夥養的「寫手」便捕風捉影，先入為主，指鹿為馬，蠱惑輿論，不但不顧事實真相隨聲附和，添油加醋，把自己貶成一隻搖尾乞食的八哥。

讓人欣慰的是，對文物市場存在的亂象，政府已經開始關注，並且下達了相關文件，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應當相信，政府有能力有辦法蕩滌文物市場的污泥濁水，還國人一個「讓藏品變為展品，讓文物傳承文化」的文物市場和文博氛圍。否則，主管部門的領銜人就應該引咎辭職。尸位素餐、無所作為，穿著袈裟不撞鐘的和尚，遲早要被趕出廟門。